



新時代儲蓄互助社運動的價值

□汪浩/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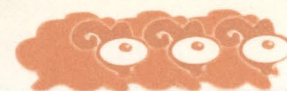
將近二十年前，當代德國社會學巨擘貝克在他的經典「風險社會」中預示了世紀個人的孤立與風險。工業社會中的家庭開始萎縮，而全球化的結果也讓傳統的國家角色進一步從社會福利的前線撤退，個人被拋擲到赤裸裸的社會無情風雨之中，雖然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失業率屢創新高，家庭與社區的崩解越來越嚴重，國家仍信誓旦旦的不放棄對其子民的基本照顧，然而在國際現實的挑戰下，政府還是不得不順應全球的潮流，將政府定位在市場競爭者的角色：「降低成本、服務（而不是保障）顧客」。然而，人的價值與尊嚴與人本身求生的本能終究還是要迎戰這樣新世紀的挑戰，傳統文化中的社會福利機制以人性的本能為基礎也重新啟動。因此，「越競爭越合作，越全球越在地，越個人

越結網」也適時地、卻也有些弔詭地突顯了世紀的時代精神。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下，傳統的合作互助事業似乎找到了她的利基，或是更正確的說：人類在逆境中互助合作的精神又再一次被（重新）呼引出來，他們相互連結，以人性的尊嚴為基礎追求共富共榮。

這樣的全球性變遷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德國的儲蓄互助社組織，在運作超過百年逐漸大型化、普遍化、商業化的同時，地方上基於新的需求，也開始了新一波的地方性合作互助運動，強調社會人類學中非營利互益的基本價值，她們不但沒有被時代所淘汰，還主動出擊結合地方資源，發展教育、社會福利，進一步經營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科技產業。一位德國的學者講的好：「金錢成了人性的接著劑」，似乎也呼應著莎士比亞的名言：「只要錢在前面走，後面的道路便暢通無阻。」自我組織網絡是行動者對貧窮的反擊。類似的民間組織越活躍，就越能反映出理性人在艱困的環境下為求生存而尋求自我解套的積極性。因此互助合作的經濟型態甚至



筆者（前排右一）假花蓮縣光復社辦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計畫問卷座談會與訪談員合影



一些自力救濟團體就是一種尋求為解決失業、貧窮、社會疏離的主要方案。因為其自助的性質，其對社會福利的貢獻是自發、主動的，不但不增加，反而會節省公共福利的支出。德國儲蓄互助社的活力也就表現在積極採用策略網絡的方式，甚至某種程度地接受其他非營利組織的贊助，以其在地方上的綿密組織與可近性為其他組織提供入口、建立基地以實現目的。

另一方面她更重要的功能是在結合地方組織的力量，以金融合作的形式來支持多項的生態與社會工程，以社會人類學為思想指導的地方合作互助金融也因此在這個過程的轉捩點上再生。譬如單單波鴻的「共同銀行」就協助地方弱勢團體，支持了一千五百多個以上前景看好的事業如有機農莊、再生資源利用、環保能源、免費的青少年兒童輔導及教育及各式各樣的小型經濟。學者魯賓說：「當人們必須離開自己的家鄉，以外銷為名，到外地去購買不再屬於故土的貨物或服務時，我們事實上所要努力的是在一段時間之後改變這樣的付款均衡，嘗試將錢留下，在自我的社區內創造財富，而不是把錢輸出。」這可能是我們對金錢在社區發展上最實際也最有力的理解。

如此我們也看到合作互助金融體系中珍貴的信任、價值、道德等等的公共財，它們必須透過人與人間長期的合作來形成，不論是在產業、地區或是產品的層面上，它們都是組織間進一步進行策略聯盟的基礎。這一種集體團結、信任、價值、道德的提昇可能是除了共富共榮以外，更

重要的意義，「她創造了認同感，讓大家對自我金錢的投入有管控的感覺，並且提高虧欠者道德中的義務感，金錢成了人際間的接著劑。」她們成了第三部門（非營利事業）的模範生，擺脫政府的依賴與干擾，避免市場的冷酷與淘汰，建立自尊、自信與自我滿足。

即使在一個已開發國家如德國，學者還是認為要解決新時代全球化所造成的新貧窮問題，共同經濟或合作經濟的組織是一項重要的發展策略，然而我們應該如何調整我們的觀念，如何破除合作互助事業那種落伍、守舊甚至頹廢的迷思與成見，我們當然可以頂著高貴的鼻子，訴說那些資本家的無知，但這不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因為即使連政府都有可能囿於自身的成見做出許多荒謬的決策；我們也不能期待企業會放鬆其競爭的野心，因為如果是這樣，全球化的腳步也不會如此神速；我們還是要回到非營利的高貴情操，問問自己是不是已經事事反求諸己，就像前人珍貴的合作精神與信念，如果志願精神已經不在，當中金錢的掙奪醜陋便會浮現，如果合作已經變成教條，那教條也正是合作事業的催魂咒，如果互助被看做老生常談，那合作事業的喪鐘便聲聲催迫。新時代的儲蓄互助社運動應該要有新思維，打破層層限制，健全監控機制，讓組織在地方上活絡起來，但重要的是一傳統的合作互助精神在哪裡？

